

PECC

亞太區域 情勢月刊

Asia Pacific Situation Monthly

3 2026 月號

2026年3月出刊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本期重要內容

經濟安全治理化下的亞太合作：日本作為制度樞紐的角色、機制
與台日合作展望

張務華

2026年亞太區域發展展望：創新與永續雙軸驅動的經濟合作

許峻賓

台灣正式步入超高齡社會：外籍照護勞動、移民整合與多元包容之關鍵性

周雨

本刊物採用環保紙

發行所 /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地址 / 台北市德惠街16-8號7樓

電話 / (02)2586-5000

創刊日期 / 1996年1月



CTPECC

台日合作

經濟安全治理化下的亞太合作： 日本作為制度樞紐的角色、機制與 台日合作展望

■ 張務華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近年來，全球政治經濟的運作邏輯經歷了結構性轉向。冷戰後的全球化秩序曾長期奠基於效率、成本與市場開放；然而自 2020 年以來，隨著全球疫情衝擊、俄烏戰爭爆發以及美中科技競爭白熱化，傳統的經濟思維已被改寫。「風險控制」與「制度治理」取代了純粹的市場效率，成為各國政策的核心出發點。經濟活動不再僅是中性的貿易行為，而是牽動地緣政治布局與國家生存的關鍵場域。

在此背景下，「經濟安全」已由原本作為危機因應的臨時手段，逐步轉化為以重構國家治理架構為核心的長期政策框架。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歐盟提出「去風險化」等策略，均顯示主要經濟體正嘗試在安全考量與經濟繁榮之間重新尋求平衡。而在亞太區域，日本的回應則展現出高度制度化的特徵，不僅率先制定《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更進一步將經濟安全內化為一套跨部會協調、具中長期導向的治理工程。

值得關注的是，儘管面臨政權更迭與政治變局，日本這套治理模式展現出強大的韌性與延續性，並逐步演化為亞太區域中的「制度樞紐」。

與此同時，台灣作為半導體與關鍵技術高度集聚的技術節點，逐漸形成其作為「技術樞紐」的結構性位置，使其與日本的制度化佈局產生深層的結構性互補。本文旨在探討日本如何建構這套穩定的經濟安全制度架構，並分析在「制度樞紐」與「技術樞紐」的交會下，台日合作如何邁向超越傳統產業互補的新型夥伴關係。

二、經濟安全的治理化與制度樞紐的浮現

回顧近年各國對「經濟安全」的政策實踐，可以清楚看出其內涵與操作邏輯正逐步轉變。這一轉變並非源於單一事件，而是隨著國際局勢演變，風險意識逐步累積，最終推動經濟安全走向制度化治理的結果。

初期各國多停留在風險辨識與盤點，例如美中科技戰凸顯對半導體、稀土與能源等關鍵物資的依賴風險，但尚未建立跨部門治理架構。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則放大這些風險，促使政府開始視其為具系統性與連鎖效應的結構性問題。此一變化，使經濟安全從危機應對邁向風險治理，跨部會協調、產業政策與國際制度合作的重要性顯著提升。

自 2022 年起，美國、歐盟與日本相繼透過立法、補助、投資審查與出口管制等手段，將經濟安全由政策倡議升級為具法律拘束力的治理架構。經濟活動的角色也因此改變，由原本被視為市場自行調節的技術性行為，轉化為與國家競爭力、供應鏈安全及制度規則密切相關的戰略工程。

在這波經濟安全走向制度化的過程中，日本的表現尤為突出。不但在國內建立起相對完備的治理架構，並透過將制度邏輯外溢至區域規則與多邊平台，逐步取得亞太治理中的制度樞紐地位。這一角色的形成，並非僅止於政策工具的堆疊或短期風險應對，而是透過高度制度化的治理安排，使經濟安全轉化為具備長期穩定性的國家運作機制。其穩定性來自法律設計、預算配置與官僚治理的交互運作，經由不斷建構與再確認，形塑出日本在區域治理中可長期維持的制度性角色。

三、日本如何成為穩定的制度樞紐

相較於許多以危機驅動或臨時政策因應為主的國家，日本之所以能長期維持政策連續性與治理穩定性，並非依賴特定政治領袖的決策，而是透過法制化、預算配置與官僚體系等多重治理機制的交互作用，逐步建構出具備持久性與外部連結能力的治理架構。

首先，在制度化治理層面，日本將經濟安全納入法律與中長程預算規劃，使其政策能跨越部會分工與選舉周期持續落實。透過跨年度預算與長期政策目標的設計，半導體、關鍵礦產與綠色轉型等領域的投資與管制措施，得以在財政與行政層面形成穩定且可預期的制度基礎。

其次，在官僚治理層面，日本的經濟安全政策並非由單一部會或短期政治人物主導，而是建立起以經產省為核心、外務省與防衛省共同運作的多層次治理架構。經濟產業省掌握產業與科

技政策，使經濟安全具備高度延續性；外務省則以自由開放印太構想及其下的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為主要平台，並在 G7 等多邊場域推動制度協調；防衛省與內閣府則負責資安、關鍵技術與跨部門協作。此種職能分工使政策能在政權更迭下保持穩定推動。

最後，在政治運作層面，日本的經濟安全呈現高度「去個人化」特徵。即便面臨政權更替或提前大選，政策方向與工具配置仍維持高度連續。例如，2026 年初眾議院提前解散所造成的政治不確定性，並未動搖半導體投資、關鍵礦產布局或綠色轉型等主要政策方向，反而凸顯經濟安全已深度內化於中長期財政規劃與多邊承諾之中。從這個角度看，選舉多反映治理方向的延續，而非政策路線的大幅變動。

綜合而言，日本作為制度樞紐的穩定性，並非源於政治領袖的個人意志，而是由制度化治理、官僚分工與政治去個人化三者交互作用所支撐。正是這些能在政治變動中維持政策連續性的結構性條件，使日本能在亞太經濟安全體系中，長期扮演可信且可預期的制度節點角色。

四、台日合作：技術樞紐與制度樞紐的交會

自 2023 年廣島 G7 峰會以來，日本將生成式 AI、科技安全、供應鏈韌性與對中國風險管理納入核心議程，推動「廣島 AI 進程（Hiroshima AI Process）」，使 G7 成為民主陣營在科技治理與資料規範上的主要制度協調平台。同時，日本亦透過 IPEF，逐步制度化供應鏈風險管理、關鍵物資清冊與危機應對機制，並將相關制度外溢至東南亞等夥伴國家。

這些制度設計並非單一倡議，而是結合法律、標準、合規流程與治理語言的整體性政策輸出。日本在東南亞長年累積的政府開發援助、基礎建設與技術合作，使其能在能源、都市治理、災害管理與人力培育等領域提供具規範性與執行力的治理方案，深化其在區域中的制度影響力。

在此制度外溢的背景下，台日於半導體與科技領域的合作也出現結構性轉變。台積電熊本投資不僅是產能配置，更被日本定位為經濟安全體系中的戰略節點，並透過補助政策、法制支援與基礎建設整備，納入日本的中長期治理架構。對台灣而言，這亦代表高度集中的技術能力與產業聚落逐步融入外部制度架構，形成新型的「制度接軌」合作模式。

這種合作不再只是傳統的產業互補，而是制度與技術能力的雙向整合。從治理層面來看，合作議題逐漸擴及設備標準、製程透明度、資安與資料保護、出口管制協調，以及可信供應鏈審查等面向，使技術合作本身成為促成制度對接的基礎，也提升雙方在供應鏈治理上的延伸能力。

台日的互補性亦從半導體延伸至人工智慧與資料安全等新興領域。日本透過 G7 議程與國內立法，逐步累積 AI 倫理、責任歸屬與資料治理方面的制度優勢；台灣則憑藉科技應用高度集聚的場域與資安實務經驗，提供制度測試與政策落地的實證基礎。若能有效分工，台日合作不僅可回應雙方需求，更具有向第三地擴散、成為區域治理參考模式的潛力。然而，此一合作模式的深化，仍有賴於雙方在法規透明度、資安與資料治理標準、出口管制立場，以及對第三方市場之政策協調上，持續進行制度磨合，否則其治理外溢效果亦可能面臨實務上的限制。

就本節分析而言，台日合作已由單一產業合作，轉向在多層次治理架構中連結制度與技術

優勢的合作形式。這一合作模式強化雙方在亞太經濟安全體系中的共同承擔能力，也為後續整體治理意涵奠定基礎。

五、結論：制度樞紐、技術樞紐與亞太治理的未來

在經濟安全治理逐步制度化的過程中，日本透過制度化治理安排、官僚體系運作與多邊制度參與，由傳統安全夥伴轉型為亞太經濟安全體系中的「制度樞紐」。法律、預算與跨部會分工所形成的長期治理工程，使日本得以在政權更迭與政治不確定性中維持政策延續性，並在 G7、IPEF 以及東南亞的區域合作場域中，扮演可信的制度協調者與規則塑造者。

台灣的戰略價值則體現在半導體、資安與人工智慧應用等領域所累積的技術能力與產業聚落，使其成為全球科技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技术節點。當經濟安全逐步被內化至國家治理架構，台灣的技術優勢與日本的制度優勢呈現高度互補，特別是在半導體治理、科技安全、供應鏈審查、資料與 AI 治理等領域，具備深化制度合作與政策協調的空間。

整體而言，台日合作正逐漸由傳統的產業協力走向兼具安全與繁榮的新型夥伴關係。此關係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也超越一般經貿協定，更近似一套以制度設計與科技合作為支柱的多層次治理架構。未來若能持續深化「制度樞紐—技術樞紐」的分工與連結，台日雙方不僅能強化彼此的安全與競爭力，更可能在印太秩序中成為具制度塑造力的行動者，對區域治理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區域發展展望

2026 年亞太區域發展展望：創新與永續雙軸驅動的經濟合作

■ 許峻賓
CTPECC 秘書長

延續 2025 年 APEC 在韓國慶州的成果，面對全球地緣政治緊張、貿易成長與公平的衡平發展、氣候變遷持續影響經濟，以及人工智慧（AI）帶動的經濟創新與可能對社會有所衝擊的雙面刃，2026 年的 APEC 在「打造繁榮共享的亞太社群」（Building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to Prosper Together）的主題下，以「開放、創新、繁榮」為優先工作；而 ASEAN 則訴求「共同航向未來」（Navigating to Our Future, Together），優先強調「和平、繁榮與以人為本」的各項工作。亞太區域不僅是全球科技發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也將是科技應用與綠色轉型的行動共同體。

● 創新：全球數位主權競合

無可諱言，創新是驅動亞太區域未來成長的基礎，而 AI 已躍升為推動轉型的核心能量。許多國家正積極且持續建置「人工智慧高速公路」，透過法規與政策並進，試圖讓 AI 能加速發展且被妥善的、負責任的應用。雖然在法制規範上許多國家立場與作法有所差異，甚至形成制

度主導的競爭態勢，但目標均是為了讓 AI 發展減少障礙，對經濟成長產生正面效益。

AI 的快速擴張也帶來了基礎建設的嚴峻考驗。未來亞太地區的競爭力將取決於四個關鍵條件：強大的運算能力、價格合理且穩定的電力供應、高品質的海量數據，以及處理數據的專業人才。在 2026 年以及未來的發展，AI 將不再僅是聚焦於「技術競爭」，而是轉向在「廣泛且全方位的社會應用」進行卡位戰，力求快速實現「AI 惠及所有人」的普惠願景，讓人們享受 AI 的果實，而非承受 AI 留下的殘骸與衝擊。

● 永續：創新帶動轉型

全球「永續發展」的概念與相關工作已超過 40 年，雖然氣候變遷的速度不見得有所緩和，但令人欣慰的是，「永續發展」不再僅是應對氣候危機的口號，而已被全球各國列為提升國家韌性與競爭力的實踐路徑。直至 2025 年的 UNFCCC 會議，多數國家都持續推進減碳目標，甚至提交 2035 年的「國家自訂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且強調「公

正轉型」的重要性；部分國家也透過能源基金等財政政策，支持企業綠色轉型，強調應對氣候變遷與促進經濟成長並非零和遊戲，而是透過個別行動計畫與共同行動計畫的交錯方案，讓全球各方得以共享果實。

放眼亞太區域，轉型行動正遍地開花。智利計畫在 2035 年前淘汰燃煤發電，利用其鋰儲量優勢建立綠色氫能供應鏈，並致力於推動大眾運輸電動化。加拿大則憑藉豐富的關鍵礦產資源與高度清潔的能源體系，力求成為全球綠色轉型的領導者。泰國、越南及印尼等經濟體，也紛紛設定了明確的碳中和時程表，透過吸引低碳產業投資，試圖在淨零浪潮中尋求新的增長點。

在永續發展的推進行動中，關鍵礦物是重要的元素之一，因為關鍵礦物的創新應用讓減碳目標得有實現的機會。惟關鍵礦物的稀缺性以及集中性，形成了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競合的重要議題；美國與多個盟國合作成立「矽和平」（Pax Silica）聯盟即在此架構下成形。

● 合作：區域整合或保護主義

歷經 COVID-19、地緣政治與經濟等影響，近年貿易保護主義似有抬頭的態勢，惟在多個研究學者與多數國家的警示之下，各國多對貿易保護主義表示擔憂，並明言應該遵循且保護推進多年自由貿易制度。因此，在美國川普總統以「公平貿易」為訴求而推進「互惠關稅」政策之際，許多國家仍持續洽商自由貿易協定（FTA）。例如，今年 1 月 27 日歐盟與印度簽署 FTA，不僅連結了全球兩大市場，也凸顯自由貿易仍是國際經濟發展的重要取向之一。

印歐 FTA 的內涵極具戰略性。印度一改過去的高度保護主義，對歐盟開放了極具敏感性的汽車市場，將關稅從最高 110% 逐步降至 10%，這將吸引歐洲頂尖的電動車與低碳技術大量湧入印度。同時，該協定覆蓋了超過 90% 的貿易商品，包括機械、化工與製藥產品的關稅減免。對於亞太區域而言，這象徵著供應鏈的重組：跨國企業正加速「Europe + India」的布局，利用印度的勞動力優勢與歐盟的高階技術標準進行整合。

此外，這份印歐協定不僅展現雙方經貿數字的增長，更帶有強烈的地緣政治意涵。面對美中貿易競爭帶來的碎片化風險，印度與歐盟的結盟提供了一種「第三路徑」，讓亞太經濟體在依賴美中兩大市場之外，有了更具韌性的替代選擇。此外，協定中納入的「貿易與永續發展」章節，也強制性地將環境保護與勞工權益與貿易條件掛鉤。當吾人過去探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是 21 世紀高標準的 FTA，印度與歐盟的 FTA 亦形塑的另一份高標準的跨區域「自由貿易」協定。

● 小結：邁向連結創新與永續的經濟合作道路

此刻，在全球保護主義與單邊貿易政策盛行的背景下，維護基於規則的自由貿易體系是全球與亞太區域共榮的關鍵，而區域經濟整合與多邊主義的合作也因此顯得比以往更加重要。2026 年的永續願景，不僅關乎環境，更關乎供應鏈的「韌性」，各經濟體更應該強調兼顧「安全」與「多樣化」的「綠色供應鏈創新方案」；惟面對此一發展趨勢，將會面臨資源的搶奪戰，

以及爭取盟國支持的合作之爭，而這對中等國家（middle powers）來說，選邊站並非最佳策略，但如何與大國合作而不會被另一方所排斥，則是一大挑戰。

「韌性供應鏈」的建構在 2026 年將被更加受到重視，而要能建立真正的韌性，透過公私部門夥伴（PPP）合作模式是重要的模式之一，引導私部門力量投入關鍵技術與基礎建設，將可對經濟發展有事半功倍之效，而這也是 APEC 與 ASEAN 推進區域合作的模式之一。

2026 年的亞太區域，各國持續透過深化連結與擴大創新應用，將挑戰轉化為成長的動力。

正如 APEC 長年自我期許的：「是理念的討論，更是實踐的平臺」。透過跨國界、跨產業的攜手合作，亞太地區將在動盪的全球局勢中，穩步邁向一個更具包容性、競爭力且永續發展的未來。這不僅是一條通往繁榮的路徑，更是一場關於科技與人類文明和諧共存的深刻探索。唯有透過合作的落實，以創新解決方案應對永續的挑戰，亞太地區才能在動盪的全球變局中，共同推進並實踐「開放、充滿活力、具有韌性且和平」的 APEC 願景。■

PECC 參與 APEC SOM1 快訊

PECC 於廣州 APEC SOM1 全體會議更新年度工作進展，並呼應 APEC 2026 三大優先方向：開放、創新、合作。

1、開放：聚焦保護主義風險

《PECC 區域形勢報告 2025–2026》指出，保護主義與貿易戰仍是亞太成長主要風險，也凸顯 APEC 在區域合作與多邊貿易體系中的關鍵性。

2、創新：AI 與貿易便捷化

PECC 於 SOM1 期間舉辦 AI 工作坊，討論 AI 在貿易便捷化的應用、資安與隱私、基礎設施落差，以及就業與技能準備等議題，後續將提出政策路徑圖與建議。

3、合作：AI × 永續發展

PECC 持續推進 ClimateTech In Focus 計畫，今年主題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Sustainability」，聚焦 AI 驅動永續解決方案，並連結 BCG 經濟等區域合作方向。



高齡社會

台灣正式步入超高齡社會：外籍 照護勞動、移民整合與多元包容 之關鍵性

■ 周雨

CTPECC 秘書處助理研究員

一、引言

根據內政部最新統計，2025 年台灣總人口為 2,329 萬 9,132 人，人口持續呈現負成長趨勢，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達 467 萬 3,155 人，占總人口比重 20.06%¹，依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台灣已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為因應高齡化挑戰，衛生福利部於 110 年修正《高齡社會白皮書》，提出「自主、自立、共融、永續」四大政策願景，並透過跨部會合作推動多項行動策略。

然而，高齡化除帶來銀髮產業與長照需求的成長外，亦對家庭、勞動市場與世代公平造成顯著壓力。2017 年衛福部調查顯示，需日常協助之失能長者中，67% 由家人照顧，17.1% 由外籍看護工照顧；主要家庭照顧者中，有超過三成因照顧而辭職或影響工作，近三成家庭經濟狀況惡化。² 此一現象顯示，長者照顧已由家庭問題

轉化為結構性公共議題，其中外籍照護勞動扮演關鍵角色。本文將聚焦外籍看護工及其他外籍勞工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與其現行制度地位，並分析在高齡化背景下，積極接納與制度性整合外籍勞動力，為何將對台灣整體經濟與社會福祉產生淨正向效果。

二、台灣外籍看護與移工制度的現況與限制

目前台灣外籍看護工與移工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依近年勞動部統計，來源國前五名大致為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與馬來西亞，其中印尼在家庭看護工中占比最高³。這些國家都為亞太經濟合作（APEC）成員，顯示台灣的勞動力流動本質上已深度嵌入亞太區域分工體系。

1 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2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
<https://dep.mohw.gov.tw/dos/lp-5095-113-xCat-y106.html>。

3 勞動部，《外籍移工人數與國籍別統計》，
https://statfy.mol.gov.tw/index12.aspx?utm_source=chatgpt.com。

在制度設計上，外籍看護工多以「特定雇主、特定用途」為原則，工作內容集中於失能長者照護，居留年限、轉換雇主、永久居留與家屬團聚皆受到嚴格限制。此種制度雖有助於短期補足照護缺口，卻也造成外籍看護工長期處於高度依附、低保障的狀態，限制其語言學習、社會參與與職涯累積，進而影響照護品質的穩定性。

從家庭角度來看，外籍看護工確實在短期內緩解了照顧壓力，但由於制度將照護責任高度私有化，家庭仍需承擔高額費用與管理成本，國家角色相對被動。這也意味著，若未能從「暫時勞動補充」轉向「長期照護人力政策」，台灣將難以應對未來更劇烈的人口老化衝擊。

在居留與定居制度層面，台灣對外籍看護工與多數外籍移工，尚未建立清晰且一致的永久居留或長期定居途徑。現行制度下，外籍看護工主要以「補充性勞動力」身分存在，其居留資格高度依附於單一雇主與特定工作項目，居留年限雖可累積延長，但仍面臨顯著制度限制。相較於專業技術人才或高階白領移民可透過《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申請永久居留，外籍照護與基層勞動者即便長期在台服務，仍難以取得相應的法律身分保障，導致外籍看護工長期處於身分不穩定、未完全納入社會成員的灰色地帶。

三、西方移民焦慮與右派民族主義的興起：台灣的距離與相似性

近年來，歐美多國出現對移民高度警惕的政治氛圍，右派民族主義與反移民論述明顯升

溫。從歐洲極右政黨在選舉中的突破，到美國政治中對移民與邊境議題的高度動員，移民逐漸被描繪為壓低工資、侵蝕福利、甚至威脅文化認同的「替罪羊」。這種情緒往往並非源於移民本身，而是與所得停滯、階級流動受阻與政治菁英失靈等結構性問題高度交織。

相較之下，台灣尚未出現大規模、制度化的反移民政治動員。然而，隨著外籍移工與新住民人口持續增加，社會中仍可觀察到潛在的緊張與分歧，例如對外籍看護工「搶工作」的誤解、對文化差異的刻板印象，或對社會資源分配的疑慮。這些現象顯示，台灣並非免疫於國際趨勢，而是正處於關鍵的政策及社會輿論的分水嶺：是提早透過制度設計引導共融，還是任由焦慮累積，最終走向此議題的政治化。

四、移民整合的經濟史證據：誰能成功、為何成功

要真正理解移民所帶來的影響，我們不妨從歷史的角度尋求可考證的客觀證據，美國自古就是個由移民建造的大國，經濟學家 Abramitzky、Boustan 與 Eriksson 對於 1850-1913 美國大規模移民時期的研究發現，多數移民都能夠順利的同化當地，他們的研究發現，這些移民的職涯路徑在相對短時間內即可與本地人口趨於一致；且若無法適應，往往會選擇返鄉，形成一種自我篩選機制。簡言之，對於移民來說，離鄉背井在金錢、時間及精神層面都是成本不斐的一筆投資，因此並不是任何人都會輕易選擇移民的。⁴

4 Ran Abramitzky, Leah Platt Boustan, and Katherine Eriksson. "A Nation of Immigrants: Assimilation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2, no. 3 (2014): 467-506. <https://doi.org/10.1086/675805>.

經濟學家 Spitzer 與 Zimran 的研究更進一步證實了自我篩選機制的存在，在針對 1907–1925 年間義大利人移民美國的研究亦顯示，即使該移民是來自義大利經濟條件較差地區，他們也普遍是該地區能力及條件較好的人選。⁵ 這兩項研究也證實了移民並非吸收他國所不需要的人才，而是大有機會在移民後造成當地正向影響的一群人，因此就政策端，應該透過明確的居留與定居方案加強鼓勵我們所需要的外國人才來台。

五、結論：以亞太為舞台的高齡化解方

對台灣而言，外籍看護工並非權宜之計，而是高齡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支柱，甚至這並非僅侷限於長期照護領域。無論是在製造業、營建業等藍領產業，或是在醫療、科技與專業服務等白領部門，台灣未來皆將持續仰賴外籍勞動

力以維持產業運作與經濟動能。外籍勞工不僅補足人力短缺，更在技能、經驗與跨文化連結上，為台灣經濟注入新的活力，其角色應被視為結構性且長期性的勞動資源，而非短期替代方案。APEC 作為促進人員流動、技能合作與制度對話的平台，正提供台灣一個降低政治敏感度、深化區域合作的管道。

在超高齡化已成既定事實的情況下，問題不再是「要不要外籍勞動力」，而是「如何設計一個讓家庭、勞工與社會三方共贏的制度」。若台灣能在此議題上走在前端，不僅可緩解照護危機，更有機會向國際展示：在理性政策與包容制度下，移民與移工可以是社會韌性的來源，而非造成社會分歧的導火線。台灣向來以人民的素養與獨有的人情味為榮，在此議題上，台灣是否能走出一條不同於歐美當前兩極化社會的道路，仍可保持一定的信心與期待。■



5 Yannay Spitzer and Ariell Zimran, "Like an Ink Blot on Paper: Testing the Diffusion Hypothesis of Mass Migration, Italy 1876-1920," NBER Working Paper 30847 (2023), <https://doi.org/10.3386/w30847>.

APEC 高層衛生與經濟會議 (HLMHE) : PECC 參與情形

第 15 屆 APEC 高層衛生與經濟會議 (High-Level Meeting on Health and the Economy, HLMHE) 於 2025 年 9 月 15 日至 16 日在韓國首爾舉行，由韓國保健福祉部部長 Jeong Eun Kyeong 主持。來自各 APEC 經濟體的衛生領域官員、地方與區域專家及民間部門代表齊聚一堂，凸顯衛生議題在亞太經濟合作架構中的重要性。

本屆會議討論焦點主要涵蓋三大面向：其一是醫療領域中的人工智慧 (AI) 應用，包括運用 AI 強化疾病預防、診斷與治療，以及資料治理與倫理規範等議題；其二是建構對高齡友善的區域，探討在快速高齡化下，如何整合照護體系與社會支持，促進健康老化；其三則聚焦於強化青年心理健康與賦權，關注青少年與青年族群在壓力、就學與就業轉換下的心理韌性與服務可近性。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ECC) 由 National Center for APEC 的 Nicole Vukonich 代表與會並發言。她特別介紹 PECC 近期通過的《2025 汝矣島宣言》，說明 PECC 如何從開放貿易、負責任 AI、人口結構與氣候行動等面向回應區域發展挑戰；同時分享 2025 年旗艦計畫「因低生育率與人口高齡化導致的 APEC 區域勞動力短缺」的初步成果，並提出四項優先方向：

- 1、強化生育與家庭形成政策，減緩人口結構失衡趨勢；
- 2、透過科技與人力資本投資提升生產力，在勞動力縮減下維持經濟動能；
- 3、擴大社會保障、財政永續性與全民健康覆蓋 (UHC)，確保長期照護與醫療體系的穩定；
- 4、促進區域合作、人員流動與包容成長，以跨境協作回應勞動力短缺與技能落差。

會議期間，來自民間部門的領袖亦受邀出席由 ABAC Korea 舉辦的午餐會，與部長及各代表團團長就健康資料治理、資料應用案例及 AI 醫療創新等主題進行交流，討論如何在保障隱私與安全的前提下，善用健康資料與新興技術提升醫療品質與系統效率。

PECC 對衛生與經濟議題的投入，也獲得與會部長於會後聯合聲明中予以肯定。聲明除重申醫療 AI、健康老化及青年心理健康等優先議題外，並鼓勵各經濟體共同規劃更積極與預防導向的衛生政策，推動建構健康、智慧且包容的亞太未來。PECC 將持續透過研究與政策對話，為 APEC 在衛生與經濟交叉領域的合作提供專業支援。



詳細文章請掃 QR Code

青年參與形塑未來 PECC：跨世代合作的新動能

在科技快速演進、人口結構劇烈變化與貿易體系重組的背景下，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愈加重視青年如何參與政策對話、提供新視角並為區域合作注入創新能量。NZPECC 成員 Mia Mikic 近期撰文分析韓國與香港的青年計畫，突顯青年參與在 PECC 框架下的重要性與發展潛力。

韓國 KOPEC 青年計畫：在第 32 屆全體會議中展現實質參與

2025 年 8 月韓國首爾舉行的第 32 屆 PECC 全體會議中，KOPEC 安排了 20 位大學生擔任青年大使，並以人工智慧（AI）與人口變遷為主題展開預備研究。他們在會議期間旁聽全體與執行委員會討論、訪談與談人，並以數位內容推廣理解。

其中兩組青年隊伍更在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正式簡報，分別為

- AGEnda 小組：〈跨世代合作因應人口變遷〉
- VOYCE 小組：〈AI 時代的就業創造策略〉

學生的洞察力與具創意的政策建議獲得多位委員高度肯定。不少委員更建議將青年參與制度化，並讓 KOPEC 於未來持續推動此類倡議。

香港 HKCPEC 青年計畫：跨國合作新契機

香港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長期推動青年參與 APEC、PECC 相關議題，包括政策座談、實習與研究活動。此次會議期間，多位執委表示有意與 HKCPEC 合作，共同發展跨國「PECC 青年計畫」，擴大人才培育網絡。

青年參與為何重要？

文章指出，青年對科技應用、商業模式與社會創新具有天然敏感度，能為 PECC 面對的多重挑戰提供實務洞見，包括：

- 數位貿易與 AI 治理
- 永續成長與氣候行動
- 供應鏈韌性
- 人口結構轉型

結構化的青年計畫不只提升政策討論的多元性，也有助於在 PECC 內部建構跨世代的知識延續與長期承諾。



展望：青年是 PECC 下個十年的關鍵資產

Mikic 認為，韓國與香港的案例顯示，青年參與不應只是附屬活動，而 PECC 極需強化的核心工作之一。透過跨經濟體合作，PECC 能建立一個具備國際視野、理解區域議題並能延續其使命的青年領袖社群。



資訊欄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係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出版，CTPECC為國內產官學所組成的非營利性區域經濟合作組織。

歡迎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Facebook 粉絲頁。



讀者問卷



徵文資訊

